

我不能不探索

彭燕郊晚年谈话录

彭燕郊 口述

易彬 整理



漓江出版社

彭燕郊 口述
易 彬 整理

我不能不探索

彭燕郊晚年谈话录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彭燕郊 口述;易彬 整理.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407-7068-6

I. ①我… II. ①彭… ②易…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7738 号

组 稿:曹雪峰

责任编辑:曹雪峰

封面设计:牛晓锐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7 字数:110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目录 mulu

一、“混沌初开未开”

——谈个人经历 1

家乡与早期阅读情况 1

早期生活 4

从桂林到香港 11

第一次文代会 16

初到湖南的境遇 19

“文革”时期的阅读与生活 23

“文革”结束之初的文化语境 27

诗歌翻译丛书 31

混沌初开未开 34

二、“我理想中的好诗还没有写出来”

——谈个人创作 36

早期写作经历 36

建国后至新时期之前的写作状况 50

“我不能不探索” 59

“想把这种心情传达给别人”	64
诗歌的散文美及其他	70
“我理想中的好诗还没有写出来”	82

三、双重变奏

——对谈创作主题	87
----------	----

“唯诗”	87
------	----

“沉重的话语”	92
---------	----

“原野”	106
------	-----

四、“中国主要的精神支柱是鲁迅”

——谈各时代的人物	115
-----------	-----

鲁迅	115
----	-----

郭沫若、冯雪峰等	116
----------	-----

艾青与胡风	121
-------	-----

施蛰存、梁宗岱、徐迟、袁水拍等	130
-----------------	-----

鸥外鸥、胡明树、番草等	138
-------------	-----

新四军作家	143
-------	-----

五、谈“七月派”

片段一	153
-----	-----

片段二	155
-----	-----

附记与附录	157
-------	-----

六、外国诗、古典诗歌、民歌与中国新诗

——与现代新诗相关的三个问题	164
----------------	-----

“必须了解整个世界诗歌潮流的大方向”	164
“中国古典诗歌里有很多很先锋的东西”	176
“民歌精神是非常真实、非常淳朴的”	184
附录	193
关于“彭燕郊访谈”的几点想法	193
“单纯就好!”：纪念诗人彭燕郊先生	205
后记	215

一、“混沌初开未开”

——谈个人经历

家乡与早期阅读情况

易：我们先来谈一谈您的家乡吧。

彭：我们家乡在福建滨海地区，靠海。地理环境非常之好，后面是山，前面是海，中间是冲积平原，非常肥沃的土地。我们那里民风也很好，夜不闭户，很少有小偷。因为地方富庶，民间音乐、地方戏很发达，我们那个县有一百多个戏班，生小孩、做寿、菩萨生日都唱戏。每个市镇都有一个戏馆，可以订戏。非常奇怪的是，每一个戏班，有人请没人请，几天之内在哪儿唱，戏馆都知道。民间乐队，我们那里喊作“十番”，也叫“十音”，一个乐队十个乐器。很多十番班子，民间音乐自发组织。教育也比较发达，有很多人去北京、上海读大学。小小一个县城，有九个中学。

易：人口也比较多吧？

彭：一百万。当时就有一百万，很多。县区范围比较大。我小时候在涵江读过书，涵江属于莆田，是一个很大的商业重镇。

涵江有一家最大的日用百货批发店，每年的营业额超过一亿。文化发达跟地方的经济发达很有关系。涵江中学是涵江商人捐钱创办的，请很多外地老师教课，作家王鲁彦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时候请这样的老师来教课，虽然是中学校，也要给一百多块钱一个月。

易：再说一说您的笔名吧。据说“彭”是如鲁迅那样用了母亲的姓，那“燕郊”呢？

彭：我母亲姓彭，我家姓陈。我就学鲁迅用母亲的姓；“燕郊”两个字其实没有特别的意思。原来我想用“芜郊”，后来觉得“芜郊”不太好听，用“燕郊”响亮一点。但是这个笔名我本来还想改的。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崇拜革命家彭湃，想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叫彭作涛。胡风第一次发表我的诗《战斗的江南季节》的时候，他来信跟我讲决定发表了，我就写封信去，我说要把笔名改为彭作涛。他说杂志已经在排印了，不容易改，就算了。反正这个名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为了应付国民党的检查官，还用过多好笔名，但主要是用这个。^①

易：据说您的家境比较富裕，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书。可以谈一谈当时大致的情形吗？

彭：是比较富裕。没有破产前，在地方上算是比较有钱的。

^① 在《我的笔名》中，他谈到：“‘陈德矩’这个名字很传统，自己一直不喜欢。10岁的时候，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寒淹’，出自《楚辞·九辩》中的‘寒淹留而无成’；并取了一个书斋名‘守拙斋’。后来因为崇拜鲁迅，就学鲁迅用母亲的姓，取名彭燕郊，也想用‘芜郊’，又觉得不太好听，用‘燕郊’响亮一点……为了应付新闻检查，还用过多好笔名，比如李熟、紫薰、吴枝董、冷唇、陈思勤、陈漾、田焰、陈寒夫、寒斋（主要是晚年写随笔类文字）等。”参见董宁文编：《我的笔名》，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39—142页。

所以家里能给我钱,喜欢买的书就能买来,后来到城里读高小和初中的时候,书就买得比较多。不过到底是小地方,只有一家书店,我就找一些同学替我搞书。我们那地方教育是很发达的,我们那里有很多北大的学生、很多在上海读书的学生,他们手上有许多书,所以很多书那时候我都有。像《语丝》,我差不多是全的,合订本,有的是我父亲买的,有的是我要同学搞来的。读高小的时候开始看外国小说,看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的小说。在当时来讲,我的条件是比较好的。我跟同学交往,主要目的就是要他们搞书,很有趣的。

易:您当时的阅读面也比较广啊!这样的童年真是“纸墨飘香的童年”!^①

彭:我对美术也非常喜欢,读高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搜集中国和世界名画的图片,画报上的,杂志上的,看到了我就搜集起来,一本一本地贴起来。本来想学美术,但是到厦门集美师范学校考美术科,没考取。因为我没有素描功底。后来,我还是在集美读了一个学期的普通师范。

易:美术爱好对您后来的写作有影响吗?

彭:当然有,影响很大。当时看新诗其实看得比较少,也没什么诗看。“五四”初期的诗,郭沫若的《女神》,胡适的《尝试集》我都不喜欢。到30年代初期,“现代派”已经起来了,徐迟、鸥外鸥、番草,都是我很喜欢的。

^① 彭燕郊在《纸墨飘香的童年》一文的结尾写道:“从遥远的童年到现在,生活中有一种香气,是我所缺少不了的,那就是纸香和印在纸上的油墨香,纸墨飘香,我精神上的氧气,没有它,我真不知会怎样活过来的呢。”见《纸墨飘香》,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79页。

易：戴望舒、卞之琳他们呢？

彭：卞之琳那时候才出来。徐志摩、戴望舒早已出来了。徐志摩的好些诗我也很喜欢，但更喜欢刘半农、闻一多的。当然了，我最喜欢、最难忘的还是《野草》。

易：这些阅读肯定给了您很大影响。据我的理解，文学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有些是很明显的，有模仿的意味；但也有些是潜在的、内在的，对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发生影响。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彭：影响不等于模仿。有朋友跟我提一个问题：你认为《野草》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作品，为什么我们却没有看见它的影响呢？我以为不能这样看影响。影响并不是从表面上去模仿，影响是精神上的。波德莱尔是现代主义始祖，后来的大诗人，马拉美、瓦雷里、兰波、阿波利奈尔，没有哪一个模仿他。“但开风气不为师”。现代文学史上很多有成就的作家都是受了鲁迅的影响，艾青肯定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在形式上模仿鲁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当然不可能不受前辈的影响，但他要是没有开拓的话，他是不可能成为作家的。

早期生活

易：您的早期写作我们另外进行专门的讨论。下面说一说您当时的生活状况吧。

彭：我后来到了大后方国统区，没有固定职业。我只教过一个学期的中学，那是香港来的一个私立中学。因为你到其他中学

去教书,你必须有个履历,告诉人家你教过什么书。我又没有什么学历。

易:生活来源呢?

彭:都是靠稿费。

易:我翻阅了《桂林文化城概况》^①,发现在桂林的时候,您在不少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包括《诗创作》、《文艺生活》、《文艺杂志》、《文学创作》、《野草》、《诗》、《自由中国》、《创作月刊》、《青年文艺》、《当代文艺》、《艺丛》、《青年生活》、《文化杂志》等等。我想问的是,所得稿费够生活用吗?诗歌稿费往往是很少的,有的时候甚至没有稿费。在《回忆胡风先生》^②里,您还谈到在桂林的时候生活很艰苦。

彭:在桂林的时候,我编过十来个月的《力报》副刊,也写了一些散文什么的,稿费一般可以维持一个人的最低生活,但结婚有了小孩后就不行了。在当时,我毕竟跟一般的写诗的人不同。我的作品还是比较有出路的,发表不成问题,在桂林的时候,也出过三四本书。

易:那您当时的生活都跟文化活动紧密相关了,可算是职业文化工作者。我看有些材料说,您当时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第二届年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创作部副部长、诗歌组组长。^③这是一种虚职,还是有些具体事务?

① 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主编:《桂林文化城概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该书为“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之一。

② 刊于《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③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662页。

彭：“文协分会”是民间团体，有一些活动，但不经常，当局的政策是“限制”我们。

易：我有一个疑问，当时的时代环境那么严峻、残酷，一个写作者没有很多时间来反复磨炼他的语言，这是不是会对写作造成某种影响呢？

彭：也不能那么说，因为你再苦、再困难，写诗到底是不能随便的。我在桂林坐牢的时候写了好些诗，我觉得坐牢对写诗倒是蛮好的。你一天到晚给关在那里，可以一天到晚想你的诗。

易：回过头来说，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啊。还是在《桂林文化城概况》里，其中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大事记》，里边多次提到了1942年到1943年间，桂林物价飞涨，作家正当的生活权益得不到保障。职业文化人的生活来源都与写作有关，外在物质环境这么恶劣，无疑会给作者带来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而这种压力往往又会反过来影响写作。

彭：也不完全吧。在当时，比如说，我和你，再加上另外一个人，三个人办一个诗刊，大概印两三千份，就可以养活我们三个人。

易：但还要养家糊口啊。特别是你有了孩子之后，生活压力不是更大了吗？

彭：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桂林当时的图书出版非常发达，很奇怪的是，诗非常受读者欢迎。那时候一个刊物，大概一两个星期就卖光了。文学艺术和环境自由很有关系。二战时期，中国是反德意日法西斯的同盟国之一，来了很多外国记者，蒋介石政权多少还要保持一种“民主国家”的形象，不能不讲点言论自由，可

以允许你办出版社、办杂志。申请到一个杂志登记号后，每期稿子送给他们审查就可以了。很明显地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八路军”、“新四军”的相关内容，他们会把它审掉。机智一点，很容易对付。

易：但是要不断地写稿子，稿子又要快速地写出，这肯定会影响作者对于艺术的追求。

彭：有肯定是有的。但我晓得的是，当时的出版社、书店、报社，当编辑的都有编辑费，出版社也要给工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是找个职业，主要找中学老师，当时的桂林，很多地下党员，都是以这个身份活动。有的中学还是地下党掌握的，像逸仙中学、中山中学。当时全国有三个文化中心，一个是延安，但是延安的东西出不来，延安的作者还把作品寄到国统区来发表。一个是重庆，重庆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还是管得比较严的，重庆的出版比不上桂林。聚集在桂林的文化人比聚集在重庆的多。一个小小的桂林，文艺刊物就有十一二种。桂系军阀要装开明，要利用进步文化装门面。这也是一个原因。

易：昆明呢？现在学界对于抗战时的昆明有很多研究，但研究路数与对“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很不一样。

彭：昆明的那些大学教授其实很少参加社会上的文化活动，很少。

易：因为西南联大活跃着一批诗人，昆明被认为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园地。以我的理解，“五四”以降，现代主义一直有人在尝试，但是也一直没有成为主流。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并不是很允许现代主义文学的生

长。到了30、40年代,在像西南联大或者类似的学院环境下,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得要更为充分一些,这和当时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学院的环境对写作者提供了某种保护作用。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到了社会、进入解放区就不用说了,到了40年代后期,现代主义诗歌也还能写,但是就会有人起来猛烈地批评你,攻击你,甚至辱骂你,你不革命,不抗战,来写这样一些别人都看不懂的诗歌。环境的作用就这样很明显地体现出来。

彭:当然,你写抗战,你写现实,也可以用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有一个问题,当时来讲,像我们这一批人,是很少读到大学的,基本上都是中学生,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条件都决定了很难读到外国的作品,抗战时期,外国的作品本来就很少进来。像西南联大那批人,就很容易接触到外国的东西,而且他们还有外国的老师,像燕卜苏,给学生讲现代诗,讲奥登的诗。

易:奥登来过中国。他对当时联大的很多诗人影响很大。

彭:奥登是1938年到的武汉。他写了《战时在中国》,译本我读过,也没有哪个去批评他们,说你们不该这么写。

易:艾青在《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朴素的歌〉序》里很猛烈地批评过啊。不过他没有点名,而是很笼统地将矛头指向了那些生活在昆明的教授诗人们。^①

彭:艾青的批评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浪潮,也没有批评家正式写文章来谈这个问题。反正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知道西南联大有这样几个诗人在那里写诗,他们的东西也很少让人看到。那里

^① 见《文艺阵地》,第6卷第4期,1942年4月。

有一个很小的刊物,《文聚》,外面的人很难看得到。他们的诗也发在别的地方,主要在大后方。桂林有陈占元办的一个杂志,《明日文艺》,陈占元是很有名的翻译家,当时他和西南联大的人有联系,《明日文艺》就发表了郑敏的诗歌。杜运燮的诗常常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

易:西南联大的诗人在《大公报》上发的比较多,那个时候沈从文在联大,他和《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的关系非常近。

彭:整个说来,他们这些人跟我们这些人完全不同。当时读者最多的还是我们这些人,他们有点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味道。应该说,在当时他们不是主流,是一个支流。后来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他们办了一个刊物,叫《中国新诗》。

易:那是1948年了,只办了五期。1947年开始有一个《诗创造》。办到近一年的时候,编辑观点发生了分歧,曹辛之等人独立出来,另办了《中国新诗》,更强调艺术性。《诗创造》也还在出,办刊宗旨变成了最大限度地刊登现实主义的作品。

彭:《诗创造》是比较杂的,那不算跟他们有关系。现在有人不称“九叶派”,而称“中国新诗派”。

易:当时他们还是写现代主义诗歌,但是像《泥土》、《新诗潮》这样的刊物写文章进行了猛烈攻击。

彭:落笔太重,给人以“攻击”的印象,很不必要,可以讨论、争论,诘难、面红耳赤不好。

易:回到前面讲的,在40年代前期,他们这些人在大学的时候,环境对他们起了保护的作用。但是到了后期,就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大学院墙的保护作用就越来越弱了。

彭：当时我没有参与这些，但是我觉得这些是不必要的。文学本性是自由的，别人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你不能就说他是洪水猛兽啊。

易：您觉得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的文学环境有多大自由呢？

彭：其实也不是自由的问题。《中国新诗》他们这个，正统并没有把他们看作是敌对的，反而把《蚂蚁》、《泥土》，也就是胡风这些看作是敌对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正统认为《中国新诗》这些人不过是唯美、不走正统路线，但是他们也不公开反对。

易：袁可嘉当时写文章，强调“人的文学”，反对“人民的文学”。^①

彭：他们的影响没有胡风大，被认为都是次要的，在香港批判胡风的时候，也批判了朱光潜和沈从文，他们两个是附带的。

易：沈从文有一段时间几乎精神崩溃了。

彭：解放军要进城的时候，北大就出现了类似于大字报这样的东西批判沈从文，沈从文就感觉末日到来了。

易：这个还是因为郭沫若的文章在前啊。郭沫若给沈从文他们定了性，大学里边才会有大字报，才会有批判文章。^②

彭：郭沫若那是重磅炸弹。北大当时有很多地下党员。

易：我的想法是，在郭沫若抛出重磅炸弹之前，沈从文他们写文章是自由的。可能会有一些争论，但是在写作上还是自由的。

彭：也不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沈从文他们有他们的园地，像

^① 即《“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刊于天津版《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7月6日。

^②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

朱光潜办的《文学杂志》，还有《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而且，巴金当时也是很支持他们的。从这个角度看，在那个时候，政治对中国文学的介入已经很深了。在国统区的代表人物是马凡陀，也就是袁水拍，当时提倡向民歌学习，大都市里边哪有什么民歌呢？马凡陀就搞出一个《马凡陀山歌》。艾青也只好沉默了。到那个时候，艾青也没有写什么东西。而且呢，艾青越来越稳重了。

易：他不断地写“斯大林万岁”之类的诗。^①

彭：他也不能不写那些东西。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悲剧人物。

从桂林到香港

易：在《荃麟——共产主义圣徒》^②里，您对自己的经历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到桂林之前，您在家乡待了一段时间。离别家乡比较长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到家乡是什么感受呢？我注意到您这样写道：“我终于说服了顽固的父亲”，您是怎样说服他的呢？说一说从家乡到桂林的大致情况吧。

彭：我和我父亲只有生理上的关系，思想上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之所以能说服他，只是因为他对我绝望，因而不得不放弃对我的期望，就是做官、发财之类的，让我“不肖”下去。

^① 1949年12月所作《献给斯大林》，以这样的句子结尾：“光荣属于斯大林！/胜利属于斯大林！/斯大林万岁！/斯大林万岁！”见艾青：《艾青诗全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723页。

^② 彭燕郊：《荃麟——共产主义圣徒》，《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